

论功利主义科学观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黄时进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功利主义科学观强调科学的工具价值、技术价值和功利价值, 是推动科学进步,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可持续发展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可能;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它对于科学本身和可持续发展也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 甚至成为产生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科技异化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逐渐失去了为可持续发展进行辩护的充足理由, 这本源于其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

关键词: 功利主义; 科学观;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3 - 0044 - 03

当今时代, 作为传统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替代形式,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实践领域,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所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始终是国际公认的权威定义, 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走向未来的共同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离不开科学技术进步的支持, 同时, 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科学观的影响。在此, 我们将分析和讨论功利主义科学观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 功利主义科学观及其产生

功利主义指一种道德理论: 仅当一个行为对所有受该行为影响的人所产生的善(功利)至少与可供人们选择的替换行为一样多的时候, 该行为才是道德上正当的。^[1]从考据学的意义上来说, Utilitarian(功利主义者)一词于1781年首次出现在边沁(Bentham, 1748 - 1832)的一封信中, 直至1802年才正式进入公众领域^[2]。从此, “功利主义”成为一门显学, 被人们泛化加以使用, “功利主义科学观”正是其结果之一, 从系谱学的追溯来讲这种观点至少在弗·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 1626)那里已经得到了完善的表达: “对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成长和进步来说, 应当依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 而假设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 我们就应当宣告它毫无价值, 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论、辩论之蒺藜时, 我们就更应当作这

样的宣告。”^[3]

这种观点以外在应用价值为科学进行辩护, “用这种方法来看科学, 我们认为它有价值, 是因为它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 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所谓“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价值”,^[4]是指这些目的乃是为个人与社会谋福利的, 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希望和道德背景。“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获得知识; 这种观点在我们社会中传播非常广泛并且居于统治地位, 因此遮蔽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其他观点。”^[5]因此, “功利主义科学观”总是与“工具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实质上是一种技术主义的理解方式, 在对科学的这类论证中, 有关科学的应用显现在于它对人类的价值。在大众媒体中支持或反对某个科学方案的论证基本上是这样建立的。科学研究方案的辩护或谴责, 是应用与它相关的技术所获结果的道德性质所决定的。

功利主义科学观的产生有其现代性的时代背景。在前现代文明中, 人的身份定位往往根据与宇宙的目的论秩序相关的社会等级差别来确定, 而存在者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本身有其意义。在这种神圣的秩序框架中, 科学研究通过作为研究者的人而从属于自然或神的目的因。当此类宏大叙事的锁链碎裂之后, 存在者的存在意义成为了问题。以笛卡儿为开端的近代主体性哲学通过现代性的反思原则来寻求存在的确定性, 开始了对存在领域的重构。通过这种重构, 反思的自我成为了基础存在确定性(无前提的存在确定性), 即

【收稿日期】 2003 - 12 - 17

【作者简介】 黄时进(1972 -), 湖南长沙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2002级科技哲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

主体,而这种基础确定性乃是一切存在之可确定性(客体)的保证。由此,自我设定的主体(人)成为了一切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随着神圣秩序框架的消解以及人成为自我设定的主体,宇宙的目的论秩序失去了其合理性,目的成为了主体的自我设定。科学研究的动力因(主体)遮蔽了传统秩序框架中目的因的独立性,科学成为一种以主体为目的指向的人类工具性活动,成为人的力量与权利的象征。功利主义科学观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整体架构中得以产生。

二 功利主义科学观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而建立在主体性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功利主义科学观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强大而持续的动力,从而对可持续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首先,功利主义科学观为现代科学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获得社会自主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成为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分。功利主义科学观产生于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语境中,传统的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规范与价值经过现代性的反思原则而失去效力或被重构,由此而开始了世界之祛魅化过程。在这种语境下,自然失去了传统秩序框架所赋予它的自身神圣性与目的性,成为可以控制的对象;制约现代科学产生、发展的传统规范与价值失去了其权威性,“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6]主体成为价值与意义的自我裁定者。由此科学活动按照它们在促进主体自我设定的目标方面的工具性效应而受到评价,摆脱了传统规范的合法性审查,成为一个自生的系统。从而促使科学进步作为社会体制促进人类进步成为可能。

以功利主义作为主要价值取向、以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为本质性要求的功利主义科学观是应和于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并且渗透到该时代科学假设的核心之中,从而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进而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现代科学以对特定的事质(Sachgebiete)领域^[7]的量化、合理化的先行筹划为其自然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一种精确的、数学化的科学才能建立起来,这正是现代科学理性的基础与科学假设的核心。这种经过量化、合理化的存在者的存在建构是具有自我确实性的主体通过表象的对象化而对置于面前的对象,通过这种对象化,对象被确定为可靠的与存在的,即具有了确定性的,只有具有这种确定性的对象(客体)才是可以加以计算与量化的,并且在此基础上才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因此,现代科学以对自然的控制为其本质性要求,正是这种内在要求导致了技术主义的科学模式。正是在这种控制性要求方面,功利主义科学观与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相互应和的。在现代性世界整体祛魅的境域下,即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功利主义科学观将科学理解为达到主体自我设定的目标的工具与手段。“目的得到遵循,工具得到应用的地方,工具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就有因果性即因果关系起支配

作用。”^[8]因此功利主义科学观以因果性为其逻辑根据,而因果性本质上要求着预测与控制。“它们说的是如果遇到一定的原因(前提)物理世界就会出现一定的结果(结论)。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性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性干涉,造成一定的原因从而得到所要求的结果。”^[9]因此,以因果性为其思维逻辑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在本质上要求对自然的控制,而科学即是这一工具。

就此而言,功利主义科学观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的本质性要求,而这种观念上的相互应和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展开,也正是作为以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人们在考虑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科学利用时,在考虑科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时,工具主义模式(instrumental mode)支配着所有其他的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识广且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无疑,这是我们的科学模型应该反映出来的一种理想形态。”^[10]在这种理想形态下,人们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推进文明,在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运用生物工程不仅可用于医药科学和食品制造,还可贡献于水体净化,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而利用太阳能可大大减轻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对大气层和环境的污染。

功利主义科学观虽然对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它对于可持续发展也显示了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用它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辩护也显得越来越乏力。这来源于其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

首先,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初衷是达到使人生活幸福的目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功利本身反而颠倒作为目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遮蔽了目的因的独立性,目的本身的内在价值与道德视野被遮蔽了起来。在传统神圣秩序框架示范之后,主体成为一切价值与意义的尺度和中心;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内在价值与道德视野也失去了神圣秩序的意义赋予,道德成为主体自我设定的相对性存在。失去了普遍的约束力,从而滑入相对主义,主体活动失去了有效的审查机制。在这种境况下,可持续发展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得不到有效的审查。同时,对自然的控制作为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内在动力占据了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领域,而原初地赋予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道德背景被功利性要求遮蔽起来,目的本身的道德背景褪色了,由此功利主义科学观丧失了为可持续发展进行有效辩护的道德语境。面对现代社会中的科技异化现象,也就不能根据其所产生的良好后果为可持续发展进行令人信服的辩护。因此,罗马俱乐部对科学技术促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技术应用于资源耗竭,污染或粮食短缺等明显问题时,对一个有限的、按指数增长的复杂系统基本问题没有影响,在这个模型里,我们甚至尝试对技术产生的利益予以最乐观的估计,但也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的最终下降。”^[11]“人类历史上新发明的长期记录的已经导致拥挤、环境退化以及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因为更高的生产率已经被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吸收。”^[12]

其次,极端的功利主义科学观狭义地解释功利规范,认

为只有当科学可直接获利时才是可取的,这种观点仅强调科学的外在应用价值而无视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投射在可持续发展上则仅从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性效应评价科学技术而无视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典型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理解方式。这是工具理性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传统秩序之被扫荡一空极大地拓展了工具理性的应用范围,这一方面带来的是解放,使人们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成为具有自我确定性的主体性存在;另一方面却是工具理性对生活进行控制的威胁,人与存在者相交涉区域的展现方式为工具理性所强求,从而遮蔽了其他意义展现方式的可能性,“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13]。科学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方式”^[14]具有多种意义展现的可能性,如美学的、宗教的、精神的等,而这种极端观点把有用性作为科学能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惟一标准,遮蔽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目的性活动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割裂了科学与人文的本有联系,必然会导致科学技术中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而本应是科学发展所追求的价值核心——求真求善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被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中无情阉割,科学技术沦为仅仅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为之设定的目标,而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挑战性的展现,“那些通过挑战的限定而得以呈现的东西专属于哪一种解蔽状态呢?”^[15]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之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以追求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合乎善的终极关怀目标而把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作为自己惟一的目因,所能感受到它们存在着惟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这根本上是与科学技术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对立。19世纪末,尼采就说过:现代人迷失了方向;20世纪中期,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却可悲地成为造成人类自身之困境的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21世纪网络时代的到来,人类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而人本身却随着对科学技术顶礼膜拜的追求和享受成为机器的附件,离斯宾洛莎的幸福越来越远,科学技术所要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仅仅就是不知所措的人徘徊在蓝天白云碧草清波这样的视野吗?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将现代科技打造成“座架”(Ge-stell),“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的方式把现代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之中”^[16]为功利主义科学观所促逼的人,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诗意的栖居”,何以可能?

再者,功利主义科学观对自然的控制性要求本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权力意志”的单方向扩张。通过现代性的世界之祛魅,传统的宇宙目的论秩序失范,自然失去了其自身的目的性,存在者在“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所获地位的意义被消解掉,工具性要求预先筹划存在者区域的存在建构”^[17]人便成为主体,而成为自我设定、自身生产的存在,“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别地把这一

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种地位当作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一种可能发挥的基础。根本上,唯现在才有了诸如人的地位之类的东西”^[18]。由此,人们失去了在传统神圣秩序框架中所曾经负有的对自然的敬畏与道德责任,在功利主义科学观促逼下,人类利用了现代科技天然地所包含的对自然掠夺的存在:“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19],人类控制意志的增强与对自然的无限制开发同步进行,无视可利用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利用科学技术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利用,这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冲突的不可避免,由此而产生了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科技异化形态,自然界也毫不留情地报复了我们: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大气污染,温室效应……人类可持续发展成为问题,蕾切尔·卡逊下面的话可以说道出了广大深受滥用科学技术造成环境生态问题之害的公众的心声:“‘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待昆虫之余,已转过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20]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的困惑与悲观: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何以可能?可持续发展何以可能?

三 简短的结语

归根到底,功利主义科学观是建立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平台之上的,而作为人类共同的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其假设的核心也共同分有着这一平台,由此功利主义科学观才能够极大地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产生和发展。但与此同时,受主体性形而上学内在缺陷制约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在现代社会中也压制了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发展。主体性形而上学在进行基本的主客体设定的同时也与原初的意义领域发生了残断(Defizienz)^[21],工具性要求遮蔽了其他意义领域的展现空间,由此工具理性的统治范围无限制地扩张了开来,存在者的存在建构为功利性要求所逼迫,这种功利性要求“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22]由此科学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方式”与原初的道德语境的意义赋予领域发生了残断,功利主义科学观的道德背景被模糊化了,同时压制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人类目的性活动的意义多样性的展示空间,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控制意志的工具性存在,而面对科技异化形态的现实,就使得在现代社会中产生了对可持续发展之合理性的质疑,功利主义科学观由此失去了为可持续发展进行辩护的充足理由。

【参 考 文 献】

- [1]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 general editor; Robert Aud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42.
- [2]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20 卷本 Volume XIX, 1989. 368.
- [3] F 培根. 新工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1.
- [4] 罗姆·哈瑞.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 邱仁宗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94.
- [5] 约翰·齐曼. 元科学导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163 - 164.
- [6][18][22]海德格尔. 世界图象的时代[M]. 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84, 88, 298.
- [7][14][17][21]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11、16、411、72.
- [8][15][16][19]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A]. 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6. 926、17、942、932 - 933.
- [9] F 拉肯. 技术哲学导论[M]. 刘武, 康荣平译.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46.
- [10] 约翰·齐曼. 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M]. 曾国屏等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20.
- [11][12]丹尼斯·米都斯. 增长的极限[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前言 8.
- [13]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城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6.
- [20]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63.

(责任编辑 许玉俊)